

# 民主斗士 教育先驱

## ——黄齐生传略

黄齐生,1879年生于贵州省安顺县么铺农村。他8岁发蒙读书,学习文史、算学、理化等知识;15岁因家境困顿失学,到安顺县城的“义兴恒”商店做学徒,饱受老板欺凌,加之耳闻目睹处处不平等的黑暗现状,蒙生了改变现实的念头,于是嗜学如命,工作之余博览群书,从中国文学、历史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及维新书刊几乎无书不读,自学而成为满腹经纶的学者。这些学问奠定了他早年的民主和教育救国的思想。

1896年他被民族资本家蔡衡武聘为“群明社”的经理。1904年被邀请到达德学校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黄齐生在达德学校传播反封建的民主自由思想,他倡议达德学校创办女子教育,聘女教师,宣传女子“天足”运动,打破了旧学校中歧视妇女的现象,开贵州女子教育之先河。辛亥革命时,他率领学生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1913年任达德学校校长,正值达德学校建校十周年,由黄齐生执笔,集体编写了贵州第一部剧本《维新梦》,宣传戊戌变法六君子的故事,并组织师生在建校十周年校庆会上公演。贵州军阀政府任命他为交通部长,他坚辞不就,兢兢业业办达德学校,还专门办了一个贫儿部,招收20多个贫人家人的子女免费入学。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他率达德学校师生集会游行,宣传救国,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亲书“勿忘五月七日”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刻碑立于校园中,以激发师生爱国热情。袁世凯称帝后,云南蔡锷首行反对。黄齐生等人以达德学校名义,通电响应云南讨袁。黄齐生在主持达德学校的教育活动中,创办《达德周刊》,宣传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婚姻自主,倡导选派留学生,促进汉苗同化等,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是贵州最早的教育性刊物。

1917年他率领王若飞等20人赴日本留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又率留日学生愤而归国。后在上海组织“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到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参观学习。1920年贵州籍学生赴欧勤工俭学,他来往于法、英、德、比之间,照料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在旅欧期间,他结识了徐特立、蔡和森、李维汉等人,与徐特立交谊尤深。他全力支持王若飞在法国

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春,黄齐生从欧洲归国返黔,协助凌秋聘办到达德学校。1926年任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因对军阀政治不满,被周西成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通缉。1929年初黄齐生离开贵州,到南京、山东等地,结识了有名的教育家陶行知、黄炎培等人。1931年获悉王若飞被捕,便前往归绥探望,黄齐生被王若飞坚定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便写了《外甥王若飞行述》一文,连同王若飞写的《致远方傅主席书》等多篇有关主张抗日救国的书信、文章,集印成册,题名《抗日战争策略》分赠亲友,激励抗日斗志。

1935年,时任达德学校校长的谢孝思聘请黄齐生回贵州主持达德学校,同敌人斗争的同时,创办达德民众图书馆,宣传社会教育的意义。

自红军长征进贵州北上抗日后,国民党顽固派大肆造谣污蔑,欺骗群众。黄齐生回贵阳后,在校内外各种场合,利用一切机会,举所见所闻,宣传红军是爱国爱民的军队,力辟谣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爆发。黄齐生大声疾呼,积极促使各校组织抗日救国会,会址设在达德学校。举行募捐、慰问等活动,黄齐生无不热情地和青年教职员一道参加。此时,王若飞出狱赴延安之消息传来,黄齐生决心前往探望并实地考察北方解放区情况。同年冬,携家人奔赴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主席赞赏黄齐生是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党外人士同情、爱护党最早的一人。在延安,黄齐生在党中央的安排和王若飞的引导下,进行了广泛的参观,亲眼看到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各方面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上下团结,万众一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艰苦卓绝地工作,前线抗战胜利捷报频传,后方朝气蓬勃,振奋人心。黄齐生勤奋学习马列主义典籍,理解了革命的真谛。亦应有有关方面邀请,结合抗战宣传,作历史故事讲演,参加抗战文艺活动,深入里弄农村访问。很多人都知道延安来了一位贵州的“大胡子黄齐生”。

1938年4月,黄齐生满怀革命乐观激情,离延安南归。抵贵阳后,各学校团体纷纷请黄齐生介绍延安情况,黄齐生无不应邀前往,每次讲演都达三、四小时而意犹未尽,彻底揭露了种种诬蔑中共抗战的不实之词,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政策。6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

言:“黄齐生从延安归来,大肆替共产党义务宣传。”黄齐生听到后坦然表示:“共产党抗日积极,有办法,我为之宣传,这确是我的义务。要我不讲,如何可能?”但风声渐紧,黄齐生便偕夫人前往昆明,经贵阳,10月抵达重庆,曾谒访八路军驻渝负责同志和黄炎培、陶行知等。

1945年1月再赴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安排黄齐生到延安许多团体、学校演讲。同时,他和延安许多革命前辈吟诗唱和,抒发革命情怀,歌颂抗战。在党的教育下,黄齐生彻底改变了“教育救国”的片面认识,深刻理解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切文化教育团体才能真正发挥革命救国作用。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国民党特务在会场行凶捣乱,打伤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等,激起全国愤慨。延安各界推举黄齐生为代表赴重庆慰问。写了《延安选举见闻记》《对于社会大学之我见》等文章,又往壁山正则艺专作《新时代做人的标准》的讲演。4月2日回重庆。6日,黄齐生约请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吕风子、陶行知、李仲公等著名人士在龙舍宴会,王若飞、谢孝思等作陪。大家畅谈民主斗争形势,信心百倍。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一行13人同机飞赴延安,因飞机失事,不幸在山西兴县东南的黑茶山遇难,享年67岁。

黄齐生一生追求民主、献身教育,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和选择,终于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争取中华民族和民主富强的光明前途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永远值得人们缅怀敬仰!

黄齐生由于与父亲离开农村较早,其故居到底在哪个村寨多年来一直是个谜,经过许多热心人士反复调研考证,2015年弄清楚了位于安顺开发区么铺镇青源村(原为青苔堡村),当地对其故居进行了修缮,2018年,适逢“四·八”烈士逝世72周年之际,为缅怀和追思黄齐生先生,修缮后的黄齐生故居于当日揭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文化旅游点正式对外开放。

中共安顺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撰稿人:罗基仁

# 揭密 0 一一

□张钧杰

## 八、0一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011基地在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5年初到1965年11月。在这近1年的时间里,采取老厂对口搬迁建成了128厂、315厂,改扩建成了185厂和新建了黔江机电安装公司。这个阶段的建设特点,是上马要求急,准备时间短,要求做到当年设计、当年建成、当年搬迁、当年投产、当年出产品,建设速度快,工程质量较好。经过努力,基本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既定任务,主要生产建设工程按计划全面实现。

第二阶段,是从1965年的下半年到1969年底。这近5年的时间是基地大规模基本建设时期,建成了34个工厂和2个辅助项目。这个阶段的建设特点是对口包建、全面铺开,“打一、备一、看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可以说,这是011基地大规模基本建设之年,大上之年。

第三阶段,是从1970年到1974年。这个时期主要是对口支援,又增建了11个辅助工厂,因而形成了011基地的第二个建设高潮,第二次基建大上的时期。

第四阶段,是1974年以后进入重点调整建设时期。但基地的建设主要在前10年,即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起来的。

三厂建设。011基地的建设序幕是从1965年128厂、315厂的对口迁建和185厂的改扩建拉开的。这3个厂是三机部“三五”期间第一批在贵州地区建成的工厂,受011基地建设第一阶段上马的项目,也是基地最早建成的项目。因此,这3个厂可谓011基地的“老厂”。其中,128厂、315厂是分别由上海118厂、天津105厂负责对口搬迁建设的;185厂则是在原基础上改扩建的。185厂原为地方国营贵阳电机厂,始建于1958年,1962年10月划归三机部第四工业管理局(航空工业局),转为国防军工工厂。

这3个厂,从1964年末开始筹建,1965年,根据三机部下发的基本建设计划,要求当年建成投产。因此,任务紧迫,且又是第一批在内地建设的工厂,对于山区建

设,还没有经验。为了如期保质地完成建设任务,3厂在组织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发动全体职工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克服一切困难,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同时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建设工厂。贵州省委等领导机关对3厂建设极为重视,在物资、劳力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3厂建设从4月初开始到11月末建成,基本实现了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搬迁、当年投产、当年出产品的目标,不但建设速度快,而且工程质量较好,为011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1966年的基建歼灭战。如果把011基地建设比作一台蔚为壮观的大戏,那么3厂的建设只不过是这大戏的一个小小的序幕,而这台戏的高潮还在后头,这就是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基建歼灭战。

鉴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战备的需要,011基地的建设一开始就提出了要“力争以2年的时间,完成原定的3年的主要任务”的口号,一切工作都要围绕1968年出飞机这一总目标来安排。为此,011工程指挥部制订了总体战略部署和1966年歼灭战役规划,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分期分批地打歼灭战,开始了5大战役。

大规模基本建设全面展开。根据总体战略部署及1966年的歼灭战役规划,在1966年进行第二战役时,就为1967年基本建设的全面、大规模的展开做了大量的施工准备工作,而且拟定了两套方案。实际上,1967年的基建计划是按第一方案制订的。1967年建设项目24个,其中工厂20个;在此基础上,还将1968年的6个项目提前在1967年建设。可见,1967年是011基地全面进入和展开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的一年,是基建全面大上的一年。然而“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形势急转直下,1967年2月4日,011办事处党、政、财、文大权被夺,011工程党委、011工程指挥部实际已经解体,各施工单位领导班子已经相继瘫痪,良好的建设条件已经失去。已经和将要掀起的大规模建设高潮很快平息下来,011基地建设跌入低潮,1968年出飞机的宏伟计划泡汤,不得不将原定的总目标退到1969年,向国庆20周年献礼。但1968年的光景并没有比1967年好,低潮的局面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

建设高潮再起。1969年2月4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调工程兵52师118团加强贵州歼击机生产基地的施工力量”的电令。为了尽快实现毛主席关于加快三线建设的指示,贵州省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和三机部军管会分别召开了力争“八一”,确保“十一”把歼-7型飞机送上天的会议。为了完成这一任务,011基地建设有了新的转机,逐步形成和掀起了新的建设高潮,建设速度有所加快,有18个工厂开始部分动用投产。

从1965年到1969年底,011基地的建设从踏勘布点、选址定点,到部分建成动用投产。5年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基地建设几乎一开始就处于困境,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由于广大干部、职工、三线建设者们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5年来,作为一个建设阶段,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首先,为初步改变航空工业的布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69年底,航空工业三线地区的规模和能力在整个航空工业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大。其次,为进一步加强航空产品的配套能力,特别是三线地区的配套能力做出了贡献,已有18个工厂部分动用投产,为航空工业的后方基地实现主辅机配套打下了初步基础。第三,锻炼和建立了一支扎根三线建设的职工队伍。

## 九、0一一的“干打垒”精神

“干打垒”,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特色建筑。它所体现的是勤俭建国精神在建筑标准上的一个局部的非常时期的具体实践。今天看来,这是不可取的。但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环境条件下,是有其进步和积极意义的。但是,把它作为带有普通意义的东西而长时间地加以强制推行,那就必然要适得其反,走向事物和历史的反面,以致发展到弊多利少,甚至带来很大的危害。

可以说,从011基地建设一开始,贯彻“干打垒”精神就提出来了。1966年3月,在011工程党委扩大会议上,“干打垒”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提出来,是“在内地建设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干打垒”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是一场阶级斗争。“干打垒”成为011基地生活性设施建设的政治建筑物,以致上纲上线修建“干打垒”的造价控制在40元/平方米以下。当时,一些工厂已经批准建设的标准住房都改成了“干打垒”,刚完工的三〇二医院病房水磨石地坪被强行要求改成水泥地坪。“干打垒”精神在011基地的前期建设中,不仅得到了不折不扣、淋漓尽致的贯彻执行,而且有所发展,各单位修建的住宅80%以上都是“干打垒”。

“干打垒”由于建筑标准过低、质量太差而无法使用,若经大修使用,也是得不偿失。仅1978至1981年的4年中,就报废“干打垒”建筑67538平方米。据不完全统计,到1981年止,报废和无法利用的“干打垒”建筑就达60%以上。可见“干打垒”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何其大矣。

作为011基地建设的教训,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及,是因为它的后果太令人难忘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矣。

# 父亲的城墙

□梁澍

对于安顺古城墙,我是颇有感情的,因为曾经的古城墙是父亲幼时与小伙伴欢娱的“天堂”,曾留下父亲的过往与奔跑的足迹。

1929年3月,父亲降生在安顺一裁缝之家。做裁缝的爷爷一直靠租店面从事缝纫业。至父亲上小学三年级时,因家中所租多年店面被房东转卖,爷爷只好另租南大街一张姓人家房屋居住。由于爷爷缝纫技艺精巧,慕名来找爷爷缝制衣物的客户颇多。因租住房屋逼仄,爷爷缝纫时常常占用父亲完成作业的地方,且为尽早完成“订单”,爷爷挑灯“加班”成为习惯,父亲每天要到子夜时分方能睡觉。就这样,原本学业优秀曾当过级长的父亲,因无法作业复习,且每晚睡眠不佳,白天上课没精打彩,学习一落千丈。

也就从那时起,父亲对入学读书有种厌倦情绪,加之经常完不成作业,被老师施以体罚,父亲害怕走进当时地处同知巷的安顺第三男校的大门,成天背着书包像野孩子一样在外晃荡。

由于经常逃学,为打发时间,父亲最喜欢到安顺古城墙上玩耍。当时,安顺城东西南北四周均有古城墙,城墙宽用一块块大石垒砌。城墙高约八九米,约二米处就会出现一垛口,垛口宽约六七十厘米。在古城墙上,父亲结识了不少调皮的小伙伴。

那时的父亲非常顽皮,常与小伙伴们自命勇敢地城墙垛口上追逐嬉戏,看谁跑得又快又稳,则视为“勇将”。及至父亲老年回忆,幼时在那又高又悬的城墙垛口上奔跑,无异于胆大包天,拿生命开玩笑,稍有不慎跌至城墙下,不说粉身碎骨也会筋骨俱断。

父亲印象中,南门城墙处有一南水关,此关为一圆形拱洞关卡,贯城河水全由此水关流出,常年水深三至四米;若遇涨水时节,大水可封闭水关门洞。为防止土匪从此水关偷渡进城,水关靠城外约一米处装有木闸门一道,此门可上下任意提升。

让父亲难忘的是,城东南角及东北角城墙上筑有土台,台上各安放一门将军炮。炮约一米五长,炮筒外径约为三十五厘米,内径约十五厘米。炮筒底端有一两厘米大小孔洞。据说此炮是专防土匪攻城而设。将军炮用法古老,大抵是先将火药装入炮筒内,继而填装铁砂,再将引线通过炮筒底端孔洞穿入,待有土匪来袭,点燃引线,引爆火药,铁砂即可喷射杀伤人群。此炮甚为笨重,重量可达千斤之多。

父亲逃学在外,常与小伙伴们凑钱买些食物在将军炮台上品尝分享。因受爷爷艰难谋生的影响,近一年多的时间,父亲白天上学时间基本都是在古城墙上虚度过。古城墙见证父亲不能安心读书的无奈,也让父亲在古城墙上的玩耍中找到一些慰藉与快乐。

及至后来,爷爷因眼力不济而改行,父亲瞬间意识到自己的不思上进,痛哭悔恨后,强烈要求转入安顺县崇德小学就读,才结束不堪回首的逃学日子,人生开始有了新的转折……

父亲垂暮之年喜欢沉浸在回忆中,说解放前安顺古城墙外非常荒凉,不时会有野狼出现,一到夜间,无人敢出城。古城墙沿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城市建设发展才逐渐拆除。

因受父亲古城墙情结的影响,工作之后,我查阅资料得知:安顺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城墙周长4650米,高8.2米。安顺城当时设有四道城门,“东门朝天,西门怀远,南门永安,北门镇夷”,并建箭楼、月城等附属建筑。再经了解,五十年代后,安顺古城墙大部分拆毁,仅存塔山东路民族饭店前约数十米的残段。

为了让人们记住历史,通过古城墙感知城市的沧桑变迁,2007年1月,我采写了《谁来保护安顺古城墙最后的“标本”》系列报道,随后引起其他媒体联动,促使该段古城墙于当年5月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8年12月进行维修,至2009年2月修复竣工。

修复古城墙时,父亲已去世八年,老人断然不知他曾经欢欣奔跑的古城墙又“复活”了,并且有他儿子的一份功劳。因为父亲时常念叨古城墙之事,耳濡目染之下,其实我早已对从未谋面的古城墙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古城墙的再次屹立,能让人记住乡愁,也让我时常忆起我的父亲。

# 味道深处的折耳根炒腊肉

□张钧杰

随着近几年贵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旅游业的方兴未艾、日益蓬勃,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在网络和媒体的推介下,更多地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而被人们熟知。正如旅游广告语中“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一样,贵州的旖旎风光让游客沉醉在靓丽风景的同时,独具特色的黔菜也让人大快朵颐,一饱口福。

说到黔菜,虽不似名满天下的大菜系出名,但在西南菜系中独树一帜,在融合川菜的麻辣鲜香,滇菜的朴实醇厚的时候,突出“香”和“辣”的特点。辣子鸡、酸汤鱼、盐菜肉、山药地鸡、宫保鸡丁等等这些家常菜是贵州人日常餐桌上的美食以外,折耳根炒腊肉更以口感的特别和风味,让人吃过回味无穷久,难以忘怀。

折耳根学名鱼腥草,又名截儿根,客家话称狗贴耳,产于长江流域以南各省,有一股刺鼻的鱼腥味。在北方,人们大抵吃不惯这味道。而在南方,特别是西南云贵川三省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美食。折耳根具有药食同源的作用,生熟皆可食用。用药有清热解毒,祛咳化痰利尿的功效。生吃凉拌则是夏天一道开胃爽口的小菜,用辣椒面、盐、酱油、味精一拌,配上一碗粥,又脆又爽口,让人欲罢不能,顷刻间便风卷残云吃个干干净净之后,还盯着盘里的酱油汤汁寻思,要不要再拌上一盘,再吃上一碗。

如果形容凉拌折耳根是小清新的话,那么折耳根炒腊肉就像唤醒味蕾醒来的灵魂伴侣。折耳根洗净,刀切或用手掐成寸余长的小段是评定会不会吃的标准。刀切虽省事,但据说手掐才更好吃。菜籽油入锅热后,倒入切成小段的干红辣椒、大蒜爆香,随后折耳根入锅翻炒,看看火候再倒入腊肉一起炒。切好的腊肉要选五花肉为佳,太瘦了吃起来又干又柴,太肥了又腻人不香,都影响口感。有些还根据个人口味放少许豆豉调味。一边炒着,一股清香和肉香的混合香味便扑鼻而来。快出锅时,洒上盐和味精,淋上极少量酱油,再画龙点睛地丢上一把蒜苗炒两下,顿时厨房的空气中的奇香就飘了出来,隔着房间也能闻到。

一上桌,大家迫不及待地夹上一筷子往嘴里送,一边眼睛盯着这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目不转睛。盘中红色的辣椒、银白的大蒜、浅白色的折耳根,褐红色的腊肉,黑亮色的豆豉,还有青青的蒜苗组合十分养眼不说,味道更是令人拍叫好绝。一般的炒菜只用菜籽油吃起来味道单一,但折耳根炒腊肉中和了腊肉的猪油,把香味完美的融合起来,使口味更加香醇丰富。来一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做成的腊肉,顿觉口中的滋味妙不可言。油而不腻的肉香伴随着折耳根清香独特的味道,这混搭的黄金组合立刻让舌尖充斥了难以描述的幸福。而尝一口软糯的折耳根,又会在蔬菜的纤维中找到口齿留香的腊肉味。这别具一格的口感把两者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揉合起来,成了挑动人食欲的动力。

除了折耳根和腊肉之外,会吃的人连佐料也不放过,炸得又干又脆的辣椒要连着吃上几筷子才会调动起舌尖上味蕾的兴奋。当然干香的辣椒也从不会让人失望,除非辣椒火候不到,没有炸脆。连着吃了两碗饭的意犹未尽中,有人会再添半碗饭,把盘中的蒜苗豆豉一股脑倒进盘里,拌着饭吃得津津有味,最后桌上只剩一个装过这道菜的空盘。

由此可见,这道深入人心和深入腹中的菜式是多么地招人喜欢。记忆里,小时候条件有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只限于冬季过春节做腊肉的时候可以吃到,不似现在一年四季随时都可品尝。这道菜在满足了人们口味之欲,深入口味的同时,也教人深入灵魂,成了漂泊在外的贵州人心中的记忆和淡淡乡愁。

